

編後語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注定將成為中國改革思想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次會議做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出乎意料地給出了不少有震懾性的「改革話語」。例如，〈決定〉確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出「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對於遲遲沒有動靜的公共部門改革，〈決定〉中「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係和去行政化」中的「去行政化」一詞，委實讓那些在高度行政化體系內悠然自得的大小幹部們，噙了一口涼風；儘管不出意料地沒有提出政治體制走向自由民主憲政的目標，但是〈決定〉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在政治八股主宰的內地文件中，多多少少呈現出與國際潮流接軌的一絲時尚氣息。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載我刊編委任劍濤教授的宏文，全面深入地剖析中國國家治理變革的可能走向。首先，儘管治理變革並不意味着威權主義政體向自由民主憲政政體的轉型，但是卻能為這種政治轉型提供制度的基礎。治理變革是西方行之有年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產物，其核心在於促成「多元共治」的格局，即一方面削弱並改善行政機制，另一方面強化市場機制和社群機制。

其次，當治理變革意味着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發生深刻變化之時，「中國奇跡」中政府主導發展的模式必定會在質疑聲浪中有所變革。當行政力量抑制了市場機制和社會力量之後，命令與控制常常導致命令與失控。中國內地在社會管理、維護穩定、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等諸多方面的混亂，在在顯示出行政機制一統天下的低效率，甚至無效性，由此對新的治理手段的渴求必定與日俱增。

再次，除了高度重視並且以正確的方式促進市場機制和社群機制的發育成熟和正常運作之外，行政機制運行方式的改革也是治理變革的重要內容。由革命造就的政黨和政府，在憲法的框架內重建新的組織制度和政治倫理，從而促使行政機制的運行走向以公開性、參與性、反應性和問責性為特徵的「善治」(good governance)，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備一環。

國家的「善治」，不僅體現在對內部事務的治理，而且還體現於對外關係的應對。在中國國力提升且民族主義隨之勃興之際，鄰邦民族主義的反彈也勢所必然，原本處在潛水狀態的領土糾紛和歷史問題紛紛浮出水面。本期「學術論文」欄目刊載了我刊編委沈志華和學界新銳趙慶雲的大作，前者討論了中國在冷戰年代處理領土糾紛的原則，後者記述了中國近代史學界在處理「沙俄侵略」議題上的糾結。兩篇文章或許會有如下的啟迪，即在對外關係的處理上，歷史主義和民族主義都綿軟無力，最終都難免讓位於深受國內外政治因素影響的現實主義。